

锵锵和鸣

凤凰卫视的角色制造与节目生产

徐帆◎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锵锵和鸣

凤凰卫视的角色制造与节目生产

徐帆◎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锵锵和鸣:凤凰卫视的角色制造与节目生产/徐帆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 - 7 - 301 - 22358 - 1

I. ①锵… II. ①徐… III. ①电视台 - 电视工作 - 概况 - 香港
IV. ①G229.27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2038号

书 名: 锵锵和鸣——凤凰卫视的角色制造与节目生产

著作责任者: 徐 帆 著

责任编辑: 谢佳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2358 - 1/G · 360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3.5印张 150千字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序一

专业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交织

朱羽君*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资深教授)

读徐帆的这本书,如同与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侃侃而谈,其用词遣句、语音语调,具有他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文风,说明这是经过他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有他独立的思想 and 见解。我喜欢读能使我产生这种感觉的论著,它少中规中矩的规格化和枯燥无味的论述,让人有阅读的兴趣。

书名《锵锵和鸣:凤凰卫视的角色制造与节目生产》,对作者徐帆来说,这个题目的选择,可能是他的经历和兴趣使然。徐帆的求学之路很特别,他分别在南北的三座名校,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的传播院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从师众多、涉猎面广,学理上能吸取各家之所长,兼容并蓄,并且广交了业界学友,参与了各种业务实践。

尤其是他在广院的三年,由于广院一贯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长期与在京电视业务单位保持各种形式的合作,而且在许多地方电视

台建立了实习实践基地,徐帆积极参与各种业务实践,兴趣甚广、获益颇丰。就拿凤凰卫视来说,上上下下有众多广院师友,有的还是广院的兼职教授,他们不把广院教师和学生当外人。这种亲密关系,使徐帆在凤凰卫视有较宽松的参与观察机会,与一些记者、编辑成为朋友,有对其进行中观、微观研究的先天优势,激发了他对凤凰卫视这一具有特殊身份、不同于内地电视台的媒体机构的强烈兴趣。

至于将研究焦点放在凤凰卫视的生产机制研究上,也源自他对该领域的学术兴趣。他认为,深入描述媒介生产过程,能够考察其中的种种社会关系和权利规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新闻体制及其结构的构成因素,理解从业者的生产实践是如何受行业和职业要求的影响、如何受各种规范和社会关系所制约的。通过媒介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去理解和解释社会,的确成为媒介研究对社会理论有所贡献的一条进路。

1996年3月,在香港成立的凤凰卫视,是一家以中国内地为根基的境外媒体,在转型中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它仍潜在地受着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受国内媒体的各种规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了境外媒体的姿态,国内的“新闻体制”、“宣传管理”不能直接、明显地加于其上,使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传播张力。因此,它相对体制内的媒介而言,能以更为丰富和生动的方式,真实而多元地呈现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徐帆以媒体社会学的视角,倚重角色理论,配合组织理论和媒介生产社会学理论,结合他较长时间对凤凰卫视进行的由里到外、由外到里的参与式体验,与在第一线的编辑、记者及不同工种人员的深度访谈,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从而深入细致地描绘和阐释了凤凰卫视生产方式的变迁和自身角色创造的媒介图景。

该书重点描述了在凤凰卫视创始期、发展期、成熟期三个阶段中,对其生产机制和角色的变迁具有重要作用的三类生产情况,即新闻生产、历史—人文生产、全媒体生产的场景和实况,描述了凤凰卫视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其上述生产如何受社会组织和行业的要求和制约,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人自身的专业主义精神和主观能动性,创造既能维持生存又能促进媒体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的“变通策略”,创造了一个有活力的、新颖的媒介角色。在论述中,笔者力求将所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涵括了被动与能动,专业与激情,边缘与高端,技术与制度各种张力之间的鲜活内容,以较深厚的学理基础、在业界的经历和体验以及对凤凰卫视的钟情,并能自如地跨越学界和业界的双重身份,具有说服力、动态地解释了凤凰卫视从“立足于境外体制媒体组织”走向“华语联络”的具体角色制造之路,使这本书获得了较为新颖的研究发现。

就我本人来说,对徐帆所书写的经历并不陌生,可以说,我是凤凰卫视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所采访的人、所经历的事,我也熟悉,所以,我非常接受笔者的论述,并欣赏这一研究的独到视角。只是,徐帆是一位颇具理想主义的青年学者,难免在对凤凰的生产机制和角色扮演的描述中,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即便如此,徐帆对凤凰卫视媒介业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应变策略的张扬,对他们在限制中创新、使生产机制从渐变中走向更为合理的方向的论述,确是中肯深刻,这也为中国内地媒介机构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生产机制范例。笔者对凤凰卫视个案的生产机制和角色创造的剖析,虽似敲边鼓,却能震荡中国媒介改革的核心地带——我想,这正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也是徐帆所要达到的期望吧。

序二 | 追寻另一种可能

陆 晔*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你不应该在传统媒介中陷得太深!”一位 IT 人士这样告诫众人,要去追寻另一种可能。2012 年,世界末日未至,创刊于 1933 年、以深度报道和权威阐释见长的美国新闻杂志《新闻周刊》纸质版却就此终结,转为全数字发行。在此之前,2008 年,拥有《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等十数家日报和二十多家电视台的美国媒介业巨头论坛报公司提出破产保护申请,就已引起轩然大波。与传统媒介的困顿局面相对应,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蒸蒸日上,正在改变媒介行业的竞争格局,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尽管目前电视仍是受众最广泛的传播媒介,但同样也身处全球化、数字化、新媒介技术的大变局当中。

电视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科技和文化奇观,广泛而又深刻地渗透到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它融入人们的私人交往和公共交往,影响人们的认知和情感,重新建构人们的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根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首次基于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的所有城镇、农村家庭户中18岁以上常住人口的总体样本,所做的《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调查:2010年全国受众每星期收看电视的平均天数为6.29天。其中83.3%的受众每周7天收看电视。在电视观众当中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约合3.2小时。显然,在当今中国,电视仍然占据着最多的闲暇时间。

然而,新技术给受众提供了获取信息和娱乐的另一种可能。同一调查发现,全国受众平均每星期上网的天数为1.48天,其中17%的人每周7天都会使用互联网。尽管这个比例比每周7天看电视的比例要低得多,但调查显示互联网使用者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约2.92小时,已远远超过了报纸读者平均每天53.13分钟的读报时间。

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互联网快速崛起的浪潮中,谈论电视业的内容生产,其意义显然无法也不应只局限于电视本身。更何况谈论的是凤凰卫视,这家注册在香港、面向全球华人、在大陆地区有着特殊影响力的电视机构——它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个案,呈现出关于“做电视”、“做视频内容产品”乃至“做品牌”、“做媒介”的另一种可能。

这部著作是徐帆的博士论文。2007年夏天,刚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一年的徐帆,来复旦参加“新闻传播理论与方法暑期学校”。短短两周的课程,为他开启了踏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另一种可能。2008年,他考入复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三年寒窗,京沪两地奔波,劳力劳心,可想而知。他选择凤凰卫视的节目生产和媒介角色实现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通过大量深度访谈获得一手资料,以媒介社会学理论来观照和诠释凤凰卫视的生产实践机制和媒介角色制造的特征与意义,既是为他深爱的电视行业描摹出一个质感细腻的个案,也是在力图整合理论和经验、为中国电视内容生

产探究另一种可能的同时,探究自我发现和自我实践的另一种可能。

“总有另一条不该走的路在他们面前,总有另一条不该过的桥……总有别的事情会发生,只是何地 and 何事的问题。”辛波斯卡这样吟诵。凤凰卫视如此,新闻周刊如此;电视如此,报纸如此;传统媒介如此,新媒介如此;学术如此,人生如此。追寻另一种可能,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态度,一种年轻的果敢和坚持。就像这部著作,以及徐帆博士本人,远非完美,却和眼前的世界一样年轻。

目 录

导论 “角色”登场:媒介生产与社会的一种勾连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媒介的角色如何实现	3
第二节 理论渊薮:角色、组织与媒介生产研究	14
第三节 方法论:质性研究的“精彩”与“无奈”	26
第四节 本书结构:章节逻辑与说明	35
第一章 凤凰于飞:生产机制与角色的演进简史	37
第一节 创始期(1996—2000):承受“归属之轻”	38
第二节 发展期(2001—2006):大中华区作为“舞台”	48
第三节 成熟期(2007—2012):“新陈代谢”正反思	60
第二章 大事看凤凰:新闻生产的能动与被动	69
第一节 新闻研究的中层理论:从生产机制进入	70
第二节 专业主义:三种悖论的检视与反思	73
第三节 新闻生产:专业主义的能动性及其制约	78
第三章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历史—人文生产的另类路径	106
第一节 媒介组织的历史—人文选择:文化生产的视角	107

第二节 凤凰卫视的另类路径:与阳光卫视的比较	112
第三节 历史—人文生产:身处边缘的拓疆和反思	118
第四章 天下被“网”罗:凤凰网为核心的全媒体生产	152
第一节 全媒体的逻辑起点:实用主义技术观	153
第二节 互联网作为“表演区”:凤凰网的生产机制及其他 ...	160
结论 锵锵和鸣:媒介生产、角色制造与体制变迁	174
第一节 “华语联结”的背后:媒介生产与角色制造的关系 ...	175
第二节 “有限创新”之外:媒介组织演进与体制变迁的关系 ...	179
第三节 重返生产机制:媒介实务层面的启示	185
第四节 研究再改进:四个方面的说明	188
深度访谈名单	190
参考文献	192
后记 待风景慢慢看透	203

“生产”媒介内容的媒介组织,是社会的在与自身沟通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联结”与中介系统^①,并且是“社会变迁的积极参与者”(促进或抵制)^②。具体到1978年以降的转型社会场景,“传媒是中国改革的舆论及话语的平台和推行工具,并且,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步的是传媒管理经营和新闻实践领域的改革”^③,由此展现出一幅既相互交织,又彼此构成的图景。

虽然“媒介化社会”(mediated society)的提法似有“媒介中心论”的嫌疑,但通过媒介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去理解和解释社会,的确成为媒介研究对社会理论有所贡献的一条进路。不过,诚如麦奎尔所言,“只有在了解媒介组织自身运作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理解社会如何影

① 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② 理查德·H.霍尔:《组织:结构、过程与结果》(第八版),张友星、刘五一、沈勇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③ 潘忠党:《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第4页。

响媒介,而媒介又是如何影响社会的”^①。基于此,媒介组织的生产机制(production mechanism)^②就成为这条进路中的关键“标识”。

那么,如何找寻这些“标识”,并以此制订“路线图”?“制图”的起点,理应是看懂“标识”,但这只是起点罢了,因为米尔斯早就提醒我们,“相信小范围的细节研究不管得到什么结果,都有助于启发我们解决或阐明结构意义的问题”^③是一种“愚蠢”的念头,导致的结果不外乎“认标不识路”——“路线图”需要呈现的是“标识”与“目的地”之间的关联,这就要求我们于媒介生产与社会之间觅求勾连。

勾连在哪里?回到社会理论的求索,“角色”(role)被看作是“为社会界定的身份及行为模式,其中有具体的规则、规范和期待存在,能规范和定向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的互动、举止及实践”^④,由此,“角色构成了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的一种联结,即存在着一个与给定社会地位或身份相适应的行为网络”^⑤,于是,角色和角色理论(role theory)便可作为一条线索登场。

本书倚重角色理论一条主线,配合组织理论和媒介生产社会学两条副线,基于凤凰卫视(1996年至今)的典范个案,检视媒介组织的生产机制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导论部分主要回答的是:为何选择凤凰卫

① 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02页。

② 生产机制,是指一个社会组织在进行生产活动时相互作用着的过程和方法——这里的过程,是一种由方法指引的过程,一定的社会理解力与组织观念在其中发生作用;这里的方法,则是一种在过程中起作用的方法,是一种“被运作”的方法而非“被理论”的方法。

③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1页。

④ Tim O'Sullivan, John Hartley, Danny Saunders, Martin Montgomery, John Fiske:《传播及文化研究主要概念》,杨祖珺译,远流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6页。

⑤ Richard A. Hilbert. *Toward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Role. Theory and Society*, 1981. 10(2).

视? 提出什么问题? 使用什么理论? 运用什么方法? 并由此说明篇章结构是如何设计的。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媒介的角色如何实现

开宗明义,媒介的角色,作为媒介组织与社会结构的一种联结,是经过生产机制的实践而在社会中实现的,并体现一种“行为的有节制的社会决定论”^①。

媒介与社会,成为上述实践与实现的条件且互为条件。环顾周遭,“媒介包围着我们,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广播、电视、报纸、书籍、互联网、电影、音乐唱片、杂志和其他形式的媒介所填满”^②。在“被媒介填满”的社会世界中,若是选择“退一步去认真思考大众媒介和它们所带来的问题,并把日常的媒介行为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去了解”^③,就先要对媒介与社会进行反思——生产机制为何具有解释力? 角色实现的社会场景又是哪般? ——以勾勒及研究问题置身的场景轮廓,从而进入凤凰卫视的个案,提出并解决研究问题。

一、生产机制的媒介研究潜力

在社会科学中,结构(structure)和能动性(agency)是一组重要概

① 毛丹:《赋权、互动与认同:角色视角中的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31页。

② 大卫·克罗图、威廉·霍伊尼斯:《媒介·社会》(第三版),邱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③ 同上。

念。从结构—能动性的框架回溯,我们发现:杜尔凯姆是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鼻祖,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力;韦伯则代表了另一个传统,他是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的鼻祖。行动理论把个体的行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把研究重点放在社会结构上,^①自此而下,各色理论在两大传统之间“徘徊”。

在社会理论的“徘徊”间透视媒介及其研究,或有两种经典理路值得反思。

一种是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主要阐述信息文化传播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双重意义。赵月枝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当前主要的是处理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全球政治经济由各国公司、政府机构和影响全球和本土权力关系的阶级组合的构建;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传播中的社会运动、日益私有化的视听空间中的公共领域状态、把公民身份塑造为消费者的资本主义等问题”^②。

另一种是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在费斯克眼中,“它的出现顺应了工业社会对于意义(meanings)的需求”^③。为此,“文化研究并不致力于预测人的行为,或将行为消解为结构,而是寻求理解及诊断人的行为。文化,在这里首先被视为一组实践、人们行动的模式及创

① 尹伊文:《“制度决定论”的神话》,载《读书》2008年第7期,第25页。

② 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前沿与路径》,参见范敬宜、李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参见罗伯特·艾伦:《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牟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造、维系和改变现实的过程”^①。于是,在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和主观主义(subjectivist)的知识论立场上,文化研究强调“语言论述与媒介再现的表意功能并非单纯的‘反映’而是‘建构’社会真实”^②。

无论政治经济学还是文化研究,各有体系、自成脉络,也诞生了一批甚有解释力的学术产品,但舒德森却告诫,“政治—经济的路径和文化的路径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惯有的对立,这种对立常常使得人们无暇顾及可以在新闻生产这个节点上观察到的种种特定的社会现实”^③;并且,科特(Simon Cottle)也不无担忧地提出: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常常只是借由文本的内容分析,就指出关于产制可能的解释、动机或原因;所有的立论根据,只不过是文本分析中一些微不足道的论点大做文章。若我们想了解,为何媒介采取某些呈现的形式,又为何媒介论述中从未出现某些人、事、物,就不能只依赖媒介内容的解读,无论那些分析多么精细,方法论又多么严谨”^④。

诚然,无论舒德森还是科特,他们的告诫与担忧,与其说是一种研究取向的反思,毋宁说是基于自身立场的辩白,为的是凸显媒介生产社会学取向的“政治正确”,正如舒氏在“打圆场”的一段话中说道:“我所回顾的有关新闻研究的各种理论取向都具有显著的优点。三种研究取向都把焦点放在特定的机构,并对这些机构中创制新闻的特定

① 詹姆斯·W. 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② Simon Cottle:《媒介组织与产制:此一领域研究的描绘》,参见Simon Cottle:《媒介组织与产制》,陈筠臻译,韦伯文化2009年版,第15页。

③ 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生产社会学》,参见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④ Simon Cottle:《媒介组织与产制:此一领域研究的描绘》,参见Simon Cottle:《媒介组织与产制》,陈筠臻译,韦伯文化2009年版,第7页。

过程予以考察,大大地推进了我们对媒介的理解。”^①不过,他们的评判,却不失公允地展示了从生产机制进入媒介研究的潜力。

而且,所谓研究的潜力,不仅是理论或方法的潜力,也是研究主体的潜力。并不讳言,作为研究主体的笔者^②对生产机制的钟意,源自过往参与和观察的经验,用李金铨的话来说,“从个人最深刻的经验向外推,思考扩及普遍的社会现象,最后竟联系到一些根本的关怀,以至于发展成一种学术志业,那么学术工作就构成一个整体,不是割裂”^③;也是斯托克斯(Jane Stokes)认为的研究“应该把你的学术兴趣和个人兴趣结合起来,所以尽力尝试把自己的经历与研究结合起来。你需要思考什么让你感兴趣”^④。

基于研究主体的潜力,关于生产机制,还可补充回应研究设计上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何关注生产机制而非内容产品?

以电视为例,虽然加剧的市场竞争导致全行业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但根据笔者的切身观察:相当比例的内地电视业者在日常工作中并不在意作为内容产品的节目及其观众反馈,大量“电视人”很少或完全不看电视(特别是自己制作的节目)。另据笔者多年游走电视研究和实务之间的经验:内容产品,由于长期、广泛曝光于大众传

① 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生产社会学》,参见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② 由于选用的是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作为研究主体的笔者,同时作为研究方法而存在。

③ 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参见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④ Jane Stokes:《媒介与文化研究方法》,黄红宇、曾妮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